

日夫科夫回忆录

[保]托多尔·日夫科夫 著

吴锡俊 王金柏 等译

新 华 出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日夫科夫回忆录/(保)日夫科夫著;吴锡俊,王金柏等译.-北京:
新华出版社,1999.1

(回顾与反思·苏联东欧问题译丛)

ISBN 7-5011-4300-5

I. 日… II. ①日… ②吴… ③王… III. 日夫科夫.T.(1911
~)-回忆录 IV. K835.4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8)第 37631 号

МЕМОАРИ

ТОДОР ЖИВКОВ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书中文版专有权由作者授予新华出版社

日夫科夫回忆录

(保)托多尔·日夫科夫 著

吴锡俊 王金柏 等译

*

新华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宣武门西大街 57 号 邮编:100803)

新华书店经销

新华出版社激光照排中心照排

新华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20 印张 插页 2 张 480 千字

1999 年 1 月第一版 1999 年 1 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ISBN 7-5011-4300-5/D·688 定价:38.00 元(内部发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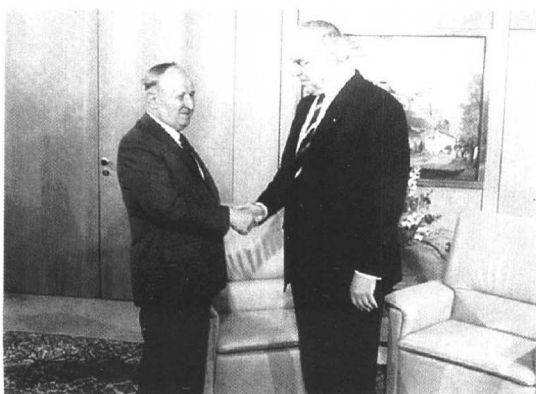
(提请读者注意:本书正版封底均贴有防伪标志)



上图 作者托多尔·日夫科夫和他的外孙女叶夫根尼亚·日夫科娃。

下图 日夫科夫和他的儿孙们在一起。照片中从左至右依次是日夫科夫的儿子弗拉迪米尔·日夫科夫、日夫科夫夫人、儿媳瓦莲蒂娜、小孙子和外孙女叶夫根尼亚、外孙斯拉夫科夫。这是日夫科夫在1990年之前同家人的合影。





上图 1987年5月日夫科夫率保加利亚党政代表团访华，同邓小平同志举行了正式会谈。

中图 1989年法国总统密特朗访问保加利亚，同日夫科夫举行了会见和会谈，并相互向对方授予各自国家的最高荣誉勋章。

下图 1987年日夫科夫访问联邦德国，总理科尔在波恩同他举行了会见和会谈。

上图 60年代中期日夫科夫作为保加利亚领导人访问南斯拉夫时在贝尔格莱德同南领导人铁托举行会晤。前排右二为铁托，左二是日夫科夫。

中图 1979年日夫科夫率领保加利亚党政代表团访问古巴时在哈瓦那机场受到古巴领导人卡斯特罗的欢迎。前排左一是卡斯特罗，中为日夫科夫。

下图 1973年苏联领导人勃烈日涅夫访问保加利亚，日夫科夫到索非亚机场迎接。前左是勃烈日涅夫，右为日夫科夫。





上图 日夫科夫担任国家领导人期间同他居住的“鲍雅纳”官邸的工人合影。

中国 1991 年保加利亚发生了政权更迭之后，日夫科夫被送上了法庭，遭到了无理审判，这是审判结束时他在法庭上慷慨陈词。



下图 1955 年苏联领导人尼基塔·赫鲁晓夫访问保加利亚时在索非亚同当时的保加利亚领导人合影。照片上站在中间、手拿帽子的是赫鲁晓夫；赫鲁晓夫右边第一人是保加利亚当时的领导人契尔文科夫；左起第四人是日夫科夫。



中文版序言

——致中国读者

亲爱的中国朋友们，我为我的回忆录将在伟大中国的首都北京出版感到由衷的高兴。我同大多数写回忆录的作者一样，一想起我个人命运的饶有兴味和绝无仅有，而我的所作所为将留下为飞逝的时光所无法很快磨灭的痕迹，我就感到欣慰。我追忆过去，不仅仅是为了描述我亲身经历过并往往同我的祖国保加利亚的现实交织在一起的许多事实，而且也是为了论证我的立场，说明我的过错，重申我的理想。

当然，我还另有所思。我曾生活在急风暴雨般的严酷世纪，这个世纪战乱频仍，冲突不断，充满了思想上、利益上的尖锐对抗。本世纪末叶，现实社会主义在世界上很大一部分地区——苏联和东欧遭到了失败。保加利亚也属于这失败的战场。为什么会这样？这一事态的蔓延是不可避免的吗？其他一些正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前进或将要踏上社会主义之路的国家应从中汲取什么教训？我试图在回忆录中回答诸如此类的难题。这些问题并不仅仅具有理论或历史的意义。它们是当今时代的一部分，它们将警示明天。如果我们弄清了这些问题，它们就能坚定我们对人类更美好未来的信念。否则，这些问题便会使我们感到沮丧，认为这种信念只不过是一种

空想和幻想……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独特作用正源于此。中国领导人的智慧，中国人民的禀性，在人类历史上曾不止一次走在进步前列的中国人民数千年的文明传统，使得中国没有像戈尔巴乔夫及其他许多前社会主义国家蹩脚的“改革者”同伙那样铸成大错。

中国读者会从我的回忆录中领悟到，我从未放弃过共产主义理想。近年来的事态发展，当今世界和我的祖国发生的变化，甚至增强了我对这一理想的信念。但是，要实现这一理想，还需要作出许多努力，也要花费大量时间，比我们先前的预想要艰难得多。在攀登更高一级文明的座座高峰的新长征中，中国的作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作用将是无与伦比的。为此，我祝愿你们充满力量、信心和胆识。

我经常回想我 1987 年在北京、上海和南京的访问，回想我同邓小平及其他中国领导人的会谈。我现在只能想象，你们国家自那时以来又取得了多么大的进步。当然，我很想亲眼目睹现在的中国，欢呼它的成就，同它的领导人交谈。遗憾的是，我年事已高，身体欠佳，再加之别的一些原因，我的这一愿望已难以实现。但是我，托多尔·日夫科夫，作为保加利亚共产党和国家多年的领导人，愿从遥远的小国保加利亚，紧握我的亿万中国兄弟、我的中国同道者勤劳的双手，祝他们勇敢地前进，一心一意地建设强盛的现代化的社会主义中国，不辜负世界人民的期望。他们向往名副其实的人生，过公正理智的生活，美好幸福的生活，值得享有的生活。

你们的托多尔·日夫科夫

1998 年 6 月 27 日于索非亚

前 言

在 1989 年 11 月 10 日之后的漫长岁月里,许多熟识或不熟识的朋友和亲戚向我提出了若干问题。他们中间不少人对我坚信不疑,他们问我,我是否深感有必要,是否觉得有义务谈谈自己,谈谈保加利亚人民在建设新保加利亚时期所走过的别无选择的艰难道路。开始,我对此表示沉默,不想急于表态。的确,在发生 11 月 10 日这个转折之前,我从来没有考虑和计划写回忆录之事。不仅如此,我甚至经常为某些名人发表的对一些有我参加的事件的回忆感到气愤和不安。原因是这些作者一般都是把自己置于事件的中心地位,称自己是当时的“首长”,不知羞耻地大侃特侃许多编造的故事。

但是,时至今日,现实迫使我必须拿起笔来。我动笔写此回忆录,并不是因为我的老迈的年纪正是进行回忆写作的黄金时期。我不想证明或反驳以前与我共过事的同事们的话语,因为他们的回忆录早已经问世。我做出写此书的决定,原因非常简单。在我心甘情愿愿为之献身的信念中充满真理:我要讲出我所记得的、不仅对我一生极其重要、而且对保加利亚的新历史也非常重要的事件。

历史是所有人创造的。从国王到庶民,每个人都在其不可逆转

的进程中占有一席之地，都承担自己的责任。历史是无情的判决。面对历史，任何事情都无法隐瞒，任何事情也都不会被忘记。

我有义务考虑这一切。不管是好是坏，我的政治家和国务活动家的名声同新保加利亚的历史是连在一起的。我是1944年9月9日和1989年11月10日两个转折时刻的参加者和见证人。我领导保加利亚执政党和保加利亚国家许多年。我透彻地了解我们的社会主义创建时期的历史的设计过程、主要事件和主要现象。创建社会主义阶段有成功，也有失败。对那段时期，我向我的人民负责，也向我的国家负责。让创建社会主义时期的历史真相正当曝光，是我的义务。我想让读者相信，对我来说，回忆录不是华而不实之辞的雕琢堆砌，而是对客观的社会需求的回答。

我动笔写自己的回忆，还面临另一个问题。很明显，在这种情况下可以采取两种不同的态度。要想从“我”的羁绊中解脱出来，要想摆脱一己的偏颇、评价和看法，这大概是不可能的。但我若顺着光滑的自我炫耀的斜坡下滑，也许很容易的。那样做，也许会收到耸人听闻的效果，但所写出的文字将会是空洞的和不真实的。所以，我选择了另一种态度。我要叙述我自己的经历，讲述我一生的活动和担任国家领导人的作用，同时，要透过作为历史创造者的人民的命运与贡献，透过社会历史进程的准镜来看待一切。

我无意使所有人都相信，我是起过特殊作用的，尽管许多事件是由于我的“亲自参与”而决定的。我一向认为，如果我不依靠全国几百万人所创造的事业，如果我不考虑新社会的客观可能和现代文明的世界发展趋势，那么我个人的作用就等于零。

因此，在我的这本回忆录中人民始终是主角。我首先要说的是人民。有些人会觉得，这样的话不会“引人入胜”。有什么办法呢？！这是我一生的思想和言行。如果我能够成功地揭示保加利亚人民根本改变了我国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创造能力，那我将会感到非常满足，因为人民所创造的那些辉煌今天仍然在继续滋润着每

一个保加利亚人的爱国之心。而人民所创造的财富目前正在被当作不值钱的贱货转卖给外国人和“自己人”。谁也没有权力一笔勾销人民多年的创造，在那些年代我们曾为实现社会主义理想付出过巨大的努力和创造热情。当年，我们始终相信，我们能够踏破天荒。

在讲述我自己的同时，我总是努力把自己同人民的遭遇，同他们的苦乐，同他们对更美好未来的追求融合在一起。我愿意把这一风格当成能决定这本回忆录面貌的几个实质性的方面之一加以采用。另一方面，我也力图揭示出深刻的变革过程，因为我们要借助于这一变革过程来实现我们的理想。我们国家所走过的道路有成功，也有失败。这条道路一直引导我们前进和攀登，引导我们走向比较富有、比较民主和比较公正的生活，走向一种可以感觉得到的人道主义现实。

我是否令人信服地指出了这种现实，读者可以自行判断。然而，达到这一现实的道路确实并不平坦。回忆录对那些偏离道义的、在我国业已确立的新斯大林化制度所导致的失败和失望也没有表示沉默。但是，这种错误的新斯大林化制度企图破坏我的和我们的理想原则也没有能得逞。所以，在我的回忆中详述了改革过程和我本人及我的战友所遇到的各种困难，也并非偶然。我详细讲述了我同戈尔巴乔夫及外国和本国的其他改革家的冲突，因为他们为瓦解社会主义效尽了犬马之劳。历史将会作出公正的判决。

我相信，读者也会仔细阅读和理解书中关于 11 月 10 日之后席卷我们国家和人民的那些破坏行为的叙述。这种破坏铺天盖地，触及了我们全社会。我不能无视出现在保加利亚的悲剧性危机和从未经受过的痛苦。我们中间的每一个人每天都能感受到这些危机和痛苦，目睹人们的灾难和死亡。如果我们对这些现实视而不见，那就是一种令人厌恶的罪过。

直到 1994 年年底以保加利亚社会党为主要核心的民主左派

赢得议会大选上台执政之前，人们都是这样看待现实的。我在这本回忆录中做出的对保加利亚发展进程的分析，主要包括 1994 年议会大选之前的阶段。

从那以后又过去两年多了，我一直怀着希望期待变革，的确也出现了某些微小的积极变化。不过，因为对时局评价发生了错误，对造成社会党人继承下来的混乱局面的真实原因不加以揭露，很多问题至今仍悬而未决，这也是事实。由于这种情况，在某些领域后果十分严重，而造成这些后果的根源并没有被清除。1997 年 4 月通过非民主途径强行实行的议会提前大选又导致了另一些政治势力上台。在我国的历史上又开始了一个新时期，国家充满了危机，每一个保加利亚人都将经受严峻的考验。

我不隐瞒，我对保加利亚社会党的现状表示担忧。它的统一已经面临很大的问题，这已不是秘密。我深信，它将有能力纠正所犯下的许多严重政治错误，不会变成资产阶级的劣等附庸。我也相信，那些立志为人民的幸福而奋斗的社会党人将有办法控制局势。

我已经处于极限年纪，而且身体也不好。我已不可能在制订党和国家的政策方面起积极作用，也不可能为纠正其错误而有所作为。我只能发表我的意见。苦短的人生就是如此。然而我还是希望那些受到保加利亚社会党排斥的、有工作能力的人们及各个生活领域的领导不要忘记，他们的事业尚未完成。要捐弃前嫌……我希望在我的这本回忆录再版时能有机会分析这些问题。

我忽又想到，我不能不恰如其分地谈及保加利亚的对外政策，我不能不涉及我同外国著名国务活动家的会见和会谈。读者将从这本回忆录的“保加利亚与世界”这一章里了解我的思想，因为这一方面的问题也不少，而且非比寻常。

我谈及我在许多国家的访问，我研究和了解这些国家，希望增进它们同保加利亚的友好情谊。我总是为历史的命运加之于我的祖国的不公正与残酷而痛苦。所以，我总是为提高祖国的地位，为

维护祖国的利益和增加它在国际上的威望而全力地工作。无愧地巩固保加利亚在全世界的地位，加强世界同保加利亚的关系，这不仅是一种思维，不仅是纲领性的想法，而且是现实的实践方针。作为人民大多数的我们，有权为这一方针的成功而骄傲。

扪心自问，我不能不承认，命运之神还是善待于我的。它使我同难以计数的人们相遇相识，而且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是很有情趣、富有聪明才智的高尚的人。我意识到了自己的义务，尽管这种意识是肤浅的，因此，我必须提及我国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和各个不同级别的几万领导者的无法替代的贡献。对那些干部来说，他们的命运和事业都是履行使徒的使命。当我一想到一群蓬头垢面的人要声嘶力竭地涂黑他们的名字，玷污他们的创造业绩时，我就心痛难忍。

在这本回忆录中我只提及在我工作的最后阶段同我有联系的几个人。对过去在中央和地方工作的、曾经同我关系很近的大多数干部我什么也没有写。这绝非偶然。我没有他们的任何消息，也不知道他们之中谁现在站在哪一边，为谁服务。他们现在是否还忠于我们的友谊？不管怎么说，我曾经同许多很能干的人一起工作过。如果他们还健在，在以后出版的回忆录中我将尝试大体上描绘一下我们曾经有过的共同岁月，而这些岁月是在我们的坚定信念和美好向往的标志下流逝的。

在这本回忆录中我不想讨论国际工人运动的问题，也不想涉及我同各国共产党、社会党和其他左派党的许多著名活动家的会见和谈话。我相信，今后我将能有机会填补这一空缺。

打开这本回忆录，读者将能发现不少迄今我从未谈过、或基本没有谈过的问题。有些问题也许会石破天惊。当然，我提出这些问题，目的并不是要唤起人们对这些回忆的兴趣，夸奖我在“抖机灵”。现在我公开说出来的这些东西也是我过去一直表示沉默的地方，之所以这样做，显然是可以理解的。

回忆录中也包括了关于政权体制官僚主义化的思想，以前在改革时期我只是以低调的方式提到过这一思想。为什么这样做，也是可以理解的。在那些年代要是用现在的方法去揭露我们制度的缺点，这几乎就等于背叛。问题严重到这种程度，在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都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官僚阶层。当时必须玩弄各种“手段”，以便能在保持“和睦”的同时不做亏心事。

让我们也谈一谈党的问题。什么象征性的词句我没有用过，“权力层”，“管理梯队”，等等。并且，谈这一切时，也都是低调处理。当然，戈尔巴乔夫不是蠢蛋，至少在一些琐事上不蠢。这也导致了“游戏”的复杂化。回忆录在很大程度上克服了当年那些所谓的婉转和有分寸。在这些回忆中我相当详实地讲述了有关这些问题的许多事情，为这些事情我冒险争斗过好多年。在以后出版的回忆录中我也许会大量地写出我一生的政治活动中趣闻式的观点和看法。如果我能得到有关包括我的回忆内容的足够的档案材料，我会写得特别有趣。

还有一些我觉得很本质的东西。现在我第一次详细叙述了关于一件事情的真实情况，即在改革的最初几年实际上是谁掌握着东西方关系的钥匙。我相信，只要抓住我同许多世界知名政治家谈话的细节，许多读者会对我所谈的内容感到吃惊。真实情况是，如果不是戈尔巴乔夫进行背叛，我们社会主义大家庭各国也许不仅能拯救社会主义，而且能对社会主义实行全面改革，而全世界，甚至包括美国，也能从这种改革中获益。那样，今天我们就能真正轰动全世界。不过，我深信我们能够获得成功。

在不破坏总的基准的情况下，我有意谈了一点儿别的详细情况。

首次出版的这本回忆录即将同你们见面了，我的意图是同大家谈谈我一生中比较重要的东西。各种客观和主观的原因令我作如此坦诚的自述，热心的读者马上就会读到它们。近年来，我成了

深受不道德的残酷迫害的对象，成了被侦查、攻击和诽谤的对象，这对谁都已经不是秘密。同时他们还没收了 my 文件，包括我早先写的回忆录。他们还取消了我的助手，剥夺了我的写作条件。他们剥夺了我的许多东西，使我无心发表言论。如果我能拥有以上被剥夺的写作条件，如果上帝能开口讲话，那我就能努力补充“这些苍白无力的思绪”，就能毫不费力地纠正回忆中出现的某些不准确。

谈到内部的和外部的“好心人”所导演的针对我的可耻的审讯，我想让读者了解真相。我不能像几百万斯大林主义的无辜牺牲品那样，在遭到十几年的监禁或集中关押之后得到了赫鲁晓夫的“判决书”，说过去对他们的谴责是错误的，他们是无罪的。对他们遭到的打击和所蒙受的不白之冤予以“甄别”，恢复名誉。对不起，我不要这样！

我的回忆中也有这类题材。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我能继续这些话题，如何继续这些话题。不过可以肯定，我会进一步展开这个话题。

有时候，特别是每当我坐下来面对这些回忆时，想到我的同胞们如此了解我，就使我非常激动。反响之所以令人难以置信，其原因就是我领导了保加利亚几十年。近七八年来，我经常阅读到对我进行的各种杜撰和捏造，这令我感到惊奇。我把这些杜撰、捏造同过去许多年中往往是同一些人加在我头上的赞誉之词相比较，反复阅读，简直使我很难相信。直到今天我也不相信，这些杜撰、捏造和过去的赞誉是出于同一批人之口！这些人的记忆力如此之差！使把一个人英雄化与捏造事实攻击此人之间的距离变得竟然如此之小。

我试着对这些引起我义愤的人和事给予回答。我希望，我的回忆能帮助读者更多地理解我这个曾经有勇气和“洞察力”领导我们保加利亚三十多年的人。

生活的迷宫使我突然面临复杂的形势和艰难的波折。我从来

没有灰心丧气过,也从来没有失去过信仰,因为我已经看到,摆在我面前的已经不是未来久远的生活,而是期待我去完成的报效祖国的义务!我能够面对人民大众!这一点我也从来没有忘记过。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我都会牢记这一点,都会用这一点来衡量我自己的行为……

目 录

中文版序言——致中国读者

前 言

第一章 童年、少年和青年时代 1

普拉维茨的普通农村孩子..... 1

遭受磨难 10

决定我一生道路的最初几步 13

索非亚国立印刷厂 21

为挣得一块面包而奋斗 25

最初的责任 28

保卫格奥尔基·季米特洛夫 31

同左倾机会主义作斗争 33

走上新轨道的党的政策 37

我亲身经历的游击年代 39

我的夫人玛拉·马列耶娃医生 59

我的女儿柳德米拉 68

留恋以往的年代 79